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D143

18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卡尔·考茨基著

叶 至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Karl Kautsky
DAS WERDEN EINES MARXISTEN
Leipzig, 1930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德〕卡尔·考茨基著

叶 至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印张 35,000字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3002·145 每册0.16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者说明

这本小册子是考茨基在 1923 年写的自传，对他在将近七十岁前的思想演变过程和著述活动提供了一些材料，可以供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个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叛徒时参考。

考茨基在本书中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拚命宣扬自己对工人运动的“劳绩”，认为自己“将作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死，正如作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活着一样”。但是即使从他的这种为自己吹嘘捧场、文过饰非的自传中，仍旧可以在不少地方看出他的修正主义叛徒真面目。例如，从考茨基的供述中可以知道，他很早就醉心于新马尔萨斯主义、杜林主义、拉萨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说，对马克思主义“抱着淡漠态度”。他从年轻时就孜孜于名利，汲汲于博取“学位”，没有很多地从事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在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他虽然名义上信服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一贯把伯恩施坦看作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强有力的引路人”，对伯恩施坦的佩服不下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同伯恩施坦“情投意合”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人们把他们比喻为“奥雷斯特和彼拉德”（希腊神话中一对生死不渝的挚友）。当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后公然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时，考茨基虽然表示了一些不同看法，写了驳斥伯恩施坦的书，但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认为这是一件不堪回首的“伤心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对伯恩施坦在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主张不但没有什么分歧意见，而且是“深具同感”的。所以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又“交往甚密”，“言归于好”，在实际行动中“几乎总是一致的”了。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考茨基之所以走上机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而是完全有其渊源的。

考茨基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吹嘘自己的学术“成就”，没有多谈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实际活动。但是，书中仍旧处处透露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他在谈到十月革命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刻骨的仇恨。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坐待“条件成熟”，而不能创造条件加以促进。他“不仅反对那种认为象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西方这一信念，而且还反对这种妄想：可以用几次强暴的打击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书中叙述了他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亲自参加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活动，怎样参与策划不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阴谋。他称誉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是东方国家的“榜样”，哀叹由于布尔什维克“入侵”而使“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结出果实之前就被活活地折断了”。

考茨基活到1938年，从1924到1938年这十四年的活动情况没有包括在这本自传里。在这十四年里，考茨基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更加忠实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对考茨基的盖棺定论，也完全可以用他在本书最后概括自己的前期活动的话来说：从他走上机会主义道路之后，他的“任何新的认识都只服务于这个目的：加深对自己所选的方向和所采用的方法的正确性的信念”。他在1927年出版了自诩为“毕生工作结晶”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1928年写成《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本书以及他在1932年发表的《战争和民主》以及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和战争》，都大肆宣扬了战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考茨基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怀着越来越深的仇恨，以致于在1930年写的《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中疯

狂叫嚣要推翻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号召所有反革命力量采取联合行动。他在晚年所写的一些内容恶毒无比的论文，美国的反共分子在他死后还特意加以编集出版（《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作为反共反革命的武器。

考茨基的这本自传最初发表在1924年来比锡出版的《近代国民经济学说的自述》一书中，后来曾出版单行本。现在我们是根据《近代国民经济学说的自述》中所载原文译出的。

(一)

我乐于接受如下要求：介绍我生平事迹的特点，同时特别注重我的经济学观点。因为我的毕生事迹已接近尾声，而且关于一生事迹的总结应该由我自己来作，所以现在正是着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

我出生时的国家制度已不复存在。1918年的风暴已把它摧毁了。但是在我的青年时代，这种国家制度已处在衰亡和解体的过程中，这种过程对于我的思想发展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我的家系就是奥地利帝国民族混杂状态的一个缩影。我是在1854年10月16日在布拉格出生的，是一个捷克人和一个德国人的儿子。我的外祖父是维也纳人，但是他的父亲则来自匈牙利（我猜想是来自克罗地亚），娶了一位意大利女子为妻。我的外祖母是奥地利东北部人。我的祖父是捷克人，而我的祖母却是波兰血统的人。

我的父亲始终抱有捷克民族思想，和他相反，我的外祖父虽然在布拉格住了将近二十年之久，却没有学会一句捷克话。当时的布拉格，按其通用的语言来说，还是一座德国城市。在1848年，他非常坚决地关心德意志的事业而反对捷克人，以致当温提什格累兹^①向起义的布拉格城进行炮轰时，群情激昂的捷克人曾使他感到苦恼万分。

后来，反动势力对待捷克人和德国人都一样残酷，于是，对

① 奥地利元帅，1848年曾率兵镇压布拉格的起义。——译者

警察统治的共同憎恨暂时调和了民族矛盾。我的双亲就在这时结了婚，我就是他们的长子。

我是在一种对专制统治的憎恨情绪中长大的，同时还带有一种对国家制度本身的藐视态度。在1859年和1866年的两次打击^①以及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爆发以后，至少在我周围的人们中间（无论是德国人或捷克人），几乎再没有人相信这种国家制度还有生存的能力。

我最初的政治思想是民族思想。我曾满怀捷克民族主义思想，而且是最激进的、胡斯式的捷克民族主义思想。但是，我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片面的捷克民族主义倾向的。我自幼说的是德语，我母亲的娘家是德意志式的家庭。我在九岁时就迁居到维也纳，但仍然是处于一种完全德意志式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从1866年以来，我在民族问题上也同情奥境的德意志人，因为我渴望奥境的德意志人同其他德意志人能在一个共和国中统一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民族问题上也同情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我崇敬科苏特，尤其崇敬加里波的。我指望由他们来摧毁奥地利。

德法战争发生时，我正处在这种当然十分幼稚的、游移不定的政治感情生活之中。我是站在加里波的那一边的。我起先对法兰西共和国，后来又对巴黎公社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在这时，我接触到一个我以前完全生疏而此后却突然牢牢抓住我的心灵的因素：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国际主义思想。

我的民族血统自始就不是单单限于一个民族。因此，我毫不费力地就接受了国际思想。我所接受的思想并不是一种对民族毫不关心和毫无了解的思想，而是一种力求以同样的关心和了解来对待一切民族的思想，并且想要以各民族之间自由和愉快的合

① 指1859年意法两国的对奥战争和1866年普意两国的对奥战争。——译者

作来使任何一个民族都能在地球上各得其所和繁荣昌盛的思想。

社会主义使我有更多的事要做。我从报纸上得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概念。当时在奥地利，一个中学生，除非特别幸运，是无法获得正确讲解社会主义的读物的，而这种好运气却偏偏不来。

因为我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是由于巴黎起义而引起的，因而也就是来自法国。我就力求获得从法国的社会主义读物里能学到的一切知识。乔治·桑的社会主义小说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这倒并非是仿佛它们使我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明确概念，这些小说确实不适于达到这种目的，但是它们却给我以力量和信心。我当时靠独自的努力而从零星的启示中所阐释的社会主义概念（当然是十分零乱的），在我周围的人们中间受到如此的嘲弄讽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他们如此的厌恶卑视，以致我自己也不免对它感到怀疑和犹豫。

这时我看到：当时深受普遍尊敬的乔治·桑期望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我从而获得了一种颇为欣慰的信心。

当我看到路易·勃朗的历史著作——大革命史、十年史以及最后还有1848年革命史——时，我就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正面知识。

然而，从中所能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终究还是极不明确和带有激情成分的。

当我在1874年看到奥地利的党刊《平等报》时，才出现了一种转折。这时我就注意阅读德国社会主义的读物，首先是拉萨尔的著作，但是我从而也注意到必须钻研国民经济学。

(二)

在1874年秋季，我才在维也纳上大学。疾病及其后果，曾使我无可奈何地延长了中学的修业期限。我在哲学系注册入学。此后不久，在1875年1月，我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的活动总是在科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兼顾两者。这一方面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另一方面，我对此无法评断。我倾向于这一见解：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对我有好处，使我获得了单方面的理论或实践所无法获得的某些认识。在本文中我只想介绍我的科学发展历程，不想介绍我的政治发展历程。但我在这里毕竟也不能完全不谈政治发展历程，因为它对我的科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在当时，党经历一个短时期的蓬勃发展之后，在维也纳陷于迅速衰落状态。党的队伍中没有人能在科学上指导我。同时在我的同事以及大学教授中间，我也找不到任何人对我所研究的问题有丝毫兴趣或者曾接触过这种问题。由于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也不敢同奥地利境外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去建立联系。因此，我就不得不在科学上毫无指引地独自摸索我的道路。

在中学里，我就对历史课最感兴趣。我曾决心要成为历史学家，同时也最爱选修历史课，尤其选听**麦克恩·布丁格**和**奥托卡·洛伦茨**这两位教授的讲课。然而我不满足于单纯的历史叙述，我力求找出一种历史理论，一种向前推动着历史进程的原理；因为谁也不给我讲这种理论，我就准备以青年人的那种胆大无畏的精神靠独自的力量来形成这种理论。我居然在二十一岁时就制定了要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世界史的大胆计划。因为这部历史当然必须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开始，于是我就也去研究

这些国家的历史。

除了研究历史之外，我还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七十年代里，整个文明世界都崇尚达尔文主义。我也热烈赞成达尔文主义；我的历史理论无非是要把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社会发展。

这种理论大约同**龚普洛维奇**教授在他的《种族斗争》一书（1883年）中所发挥的理论相仿。当然，我在1876年前后对他的理论还毫无所知。当**龚普洛维奇**发表他的那本书时，我已经把我原来的见解进一步发展成另一种见解了。

但是，除了历史和达尔文主义之外，我还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促使我去从事经济的研究。

我就立即着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这种尝试完全失败了。我灰心地放弃了它，直到我考虑到这本书毕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我必须首先学懂政治经济学。我所看到的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是简单平淡的**罗歇**著作，这本书作为初步的入门书是有益的，但在我看来却显得很枯燥无味。我后来看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书就与此完全不同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书也是如此。当时正是穆勒的声誉最高的时期。好几年来，我钻研穆勒和**布克尔**的书比钻研**马克思**的书多得多。另方面，我对于反对英国学派的**凯里**及其先驱者**杜林**的著作也很感兴趣；在七十年代，看凯里的书的人很多。然而，由于他们的狂妄和华而不实，我对他们的片面论点总抱着批判态度，对**杜林**的论点甚至怀有厌恶态度。我对另一位德国教授**谢福勒**却颇为同情，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之前的年代里他享有社会主义的声誉。除了他之外，还有**阿尔伯特·朗格**。使我同情的不是他的哲学（我当时是信仰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他的社会观点，他的社会观点与穆勒和达尔文的观点有许多共同点。

达尔文主义是我第一本著作的出发点。我当时有许多理由来

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但是同达尔文一样，我承认有机的生物都有一种超过其食物来源而繁殖的趋势。然而我反对那种认为现有的贫困导源于人口过剩的学说。在这方面，我完全赞同社会主义者们的社会批评。但是我同我的同志们有分歧，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如果社会主义消除了下层阶级的贫困，社会主义就会面临如下的危险：社会主义将由于普遍的富裕繁荣而必然导致人口过剩，从而在暂时的境况改善之后又会引起新的贫困。社会主义者们赖以驳斥**马尔萨斯**的那些理由，如认为人口的增加会神奇地适应当时食物来源的增加，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只有在新**马尔萨斯**主义中才能找出解决办法，新**马尔萨斯**主义在七十年代中期很快就取得了重要地位。

于是我写了一本书，开始参加了社会主义读物的著述工作；这本书反对那种普遍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当时，我对**马克思**还抱着淡漠态度，我的经济学观点当时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性质。

这本书的题目是《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维也纳 1880 年版，共 8 章，195 页）。这本书在 1878 年春季就已经写成，一位社会主义出版家**布拉克**讲明愿意在秋季出版此书。然而在此后不久，响起了**霍德尔**和**诺别林**那几响不祥的枪声^①，于是实行了“反社会党人法”；很长时期不能再想在德国出版社会主义书籍了。靠朋友的帮助，我设法在 1879 年与维也纳一家出版社商妥出版该书，这当然使我很高兴。为了节省印刷费，我删掉了两个原想收入的关于历史资料的附录，其中一个是关于爱尔兰，另一个是关于印度的。当时人们很喜欢以这两国作为证据来说明贫困是来自人口的迅速增加。所以我力求从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条件中找出证据，来说明其贫困是与人口增加毫不

^① **霍德尔**在 1878 年 5 月对德皇威廉一世行刺，**诺别林**在同年 6 月对德皇行刺。——译者

相干的。

随后不久，我把关于爱尔兰的附录作为小册子发表；而我费了许多心血写成的关于印度的内容丰富的长篇附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我则让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因为当我有办法出版这个附录时，我的历史观点已不再是旧的了。我已克服障碍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三)

在这个时期内，我所关心的不单单是科学问题和党的政策问题，我热心地参与了党的政治活动，活动的方式是给维也纳的党报和来比锡的《人民国家报》撰稿，在1875年以后给《前进报》撰稿。我从而就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建立了通信关系；1876年，我在前往来比锡旅行时，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有过个人接触。

自从我入大学以来，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我还考虑我个人一个问题：我应该选择什么作为我的职业？我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结合得愈紧密，我觉得在大学里教学的前途就愈渺茫。作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要说当教授，即或只当个中学教师，那也都是毫无可能的。当时，党的工作也同样使我无法获得职业。党报很穷，编辑人员为数很少，他们的工资令人想起纺织工人的工资。撰稿是没有稿酬的。

因此，我要找个职业，使我在经济上独立，并使我仍然得以继续进行科学和政治工作，因为我已经把这种工作看成是我的毕生任务。

起先我考虑，我是否应该当个律师。我就在第二学期转了系，注册读法律系。然而我不久就觉得我不适于做法学家。我的思维总采取历史形式；对于我要认识和应该认识的任何事物关系，我

总首先考虑这样的问题：它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要使我适应数学思维和法学思维，这总要使我花费很大的力气。我当律师是不会有成就的。所以我在第三学期又转回哲学系，但同时我又屈服于一种魔力，这就是艺术的魔力。

我的父亲是画家，我的祖父也是画家。从童年起，我就熟悉绘画和各种绘画理论。我在中学时代也曾出于爱好而画过许多画，因此我就很容易试图以绘画来作为我的职业。然而，由于眼病，我在几个月之后就放弃了这种生涯；虽然这种失望对我说来是十分痛心的，但这也许对我还有好处。因为，纵然我的老师曾断言我有天才，但是如果不以全部精力都倾注于艺术，就不会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既从事艺术，就不容同时专心致力于科学和政治，除非这个人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一位象**米歇尔·昂盖罗**或**辽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人物。我大概只能成为中等的画家，同时也不可能在艺术之外把精力集中于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是十分重要的方面。这样，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只能取得中等的成就。

起先，我还曾试图从事另一种艺术。我的家庭同戏剧的关系，还更超过同绘画的关系。父亲和祖父都是剧院画家，我的母亲是演员，在母亲因病而被迫放弃舞台生涯之后，她还写过剧本和小说。我在中学时就写过短篇剧本和小说。我甚至还试图把我在1875年写的一部社会小说发表。我把这部小说寄给汉堡的党报，这家报社拒绝刊登，因为它的主编不愿意为了这部小说而终生坐牢。这部小说违反了好几条法律。不久以后，我也出于另一种理由而不愿把它发表，因为它使我觉得是青年人的愚行。

难道我就不能再写个剧本——它不表现叛逆者的抗议性的反抗，而象七十年代轰动世界的施韦泽的滑稽剧一样无害——而走好运吗？我终于在1878年在维也纳使我的一个剧本在舞台上

演了；它居然并没有失败。

但是我自己却从演出中看出：我缺乏那种必要的戏剧气质。尽管有些朋友劝我再继续进行尝试，但我却有这样的信念：这种生涯也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前途。

在1879年这一年，我感到极端失望和极不如意。要给我自己打开一个不依赖国家和党的活动领域的种种尝试全都失败了。我在1878年就写成的书，在我的书桌里搁置下来，未能付印。而我对之寄以如此大的期望的党，在非常法的打击之下也显得陷于瓦解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认为一时没有更好的路可走，只有使我的大学学业至少正式告一结束。在这以前，由于在我看来还有许多更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我只是马马虎虎地进行学习。现在，我想全神贯注地从事学业，并准备博士论文。我的书不适于作为博士论文，尽管后来它出版后颇获**阿道尔夫·瓦格纳**的赞扬。但是当时还没有创设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必须写一篇历史论文，我选定这样的论文题目：**杰弗逊**同法国革命的关系。我曾特别下功夫研究过法国革命；由于参加**布丁格**教授的历史研究班，我的兴趣就转到美法两国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上去了；我当时曾想在这个研究班里取得博士学位。

我首先致力于研究美国历史及其特征，并且开始觉得自己的基础已很巩固；这时，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

法兰克福有一位相当富有的年轻的私家学者**卡尔·赫希柏格**，他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之前不久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时在实施非常法的困难情况下对党给以有力的帮助。他以金钱来支援党，并且还出版了有助于社会主义宣传的若干杂志。在来比锡，他以**卡尔·赛佛特**博士的名义出版《国家经济论丛》，这个刊物不是公开主张社会主义，而是在“国家经济”的意义上探讨

经济问题。在苏黎世，他资助《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一政治杂志的出版，并且以**路德维希·里希特**博士的名义出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年鉴》。

李卜克内西曾提醒他注意我；我在1879年这一年里给他撰写了几篇稿；他对我颇感兴趣，使我有机会出版我的书，并且在该书出版之后终于建议我前往苏黎世去给他帮忙，作为经常的撰稿人给他的刊物写稿。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我终于找到了我所寻找的道路。现在，就不用再在不同的道路之间游移不定地到处摸索和徬徨了。从这时候起，我就完全为了研究历史和经济并且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而生活着。在这以前，我从事这种活动没有任何报酬，现在这种活动则给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费用，当然在经济上暂时还是很紧的。

（四）

1880年1月，我迁居到苏黎世。我觉得我仿佛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仿佛被人从标志着当时作为维也纳的党生活的标志的穷乡僻壤拖进了当时已相当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使起先还只是通过苏黎世的德侨这一中间环节而发生这种联系的。我的视野一下子大大宽阔起来了，同时我也获得了以前我从事理论工作所缺乏的导师和引路人。

卡尔·赫希伯格与我同年，他当然不能成为我的导师和引路人。他的科学兴趣主要在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和音乐史等方面。经济学方面，他感兴趣的，只是实用部分，而不是理论部分。他的社会主义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也不能使我满意。在社会主义方面，尽管有种种疑虑，我还是逐渐愈来愈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感染。我的经济学一般知识愈多，我就愈学得懂《资本论》

并且能对它加以估价。自从我了解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后，我的历史观已开始转变；我当然不是在《反杜林论》发表以后立即就了解了它。**恩格斯**起先把他对**杜林**的批判在来比锡《前进报》以连载方式发表，该文连载很久，从1877年1月一直刊载到1878年7月！用这种方式刊载，使人得不到什么印象。单行本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初期出版的；这时，我们所关心的是其他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钻研了这一著作。在我的经济思想和历史思想方面，我力求克服我以前的折衷主义，力求具有首尾一贯的思想。

这时，我把赫希柏格的秘书**爱德华·伯恩施坦**看成是一位强有力的引导人。他比我大五岁，是在柏林长大的，而且是在当时世界上最活跃的社会主义生活的激励之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比我高明得多，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启发。他业已克服了他那一时的杜林主义倾向，并且已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

我们一起努力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就情投意合，以致别人把我们看成是红色的奥雷斯特和彼拉德。

当我们与那两位在伦敦的大师结识后，我们在学习上就获得了强大的助力；**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已经谈到了我们与这两位大师的结识过程。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赫希柏格**的著作出版活动表示极不信任，**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就在1880年秋季被派往伦敦，以便达成一种暂时性的协议。在1881年3月，我又被派到伦敦去，以便继续保持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我当时在伦敦一直住到6月，但我很少到**马克思**家里去。他的夫人已患重病，不幸的长逝已被认为是无法避免的了，因此，我对于时常前往拜访而扰乱其家庭安静颇有顾虑。我同**恩格斯**倒常常一起相处，我们的相识已变成友谊，并且导致了密切的交往（部分是口头交往，部分是书面交